



#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与企业创新

周云波 章骏斌 郭金兴

**摘要：**保持持续且较快的经济增长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现代化目标的前提条件。持续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我国实现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的主要路径，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企业创新是产业升级和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促进企业创新需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弘扬企业家精神，并增强政策环境的可预测性。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经济增长 产业升级 企业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是指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库兹涅茨，1999）。从人类漫长的历史来看，这是一种极为晚近才出现的现象。在长达一万年左右的农业社会，尽管人类也实现了大规模的财富积累和巨大的技术进步，但是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是极为缓慢的，而且发展过程往往因战争或灾荒而中断，很多曾经创造过辉煌成就的文明都湮灭在历史尘烟之中。自16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思想观念和文化制度的巨大变革引发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集中体现为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萌发的工业革命（莫基尔，2020）。在这一过程中，从世界范围来看，不仅人口规模大幅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也实现了持续

提高，这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总体上的生活状况。这一观念、制度、技术和增长模式的全面转型，就是所谓的“现代化”（钱乘旦，2012）。

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特色和本质要求，指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国家社会发展状况和发达程度达到世界先进和前沿、世界各国现代化共同的量的规定，又有符合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中国自身特色的质的特性（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2022）。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量的要求，也是体现中国式现代化质的特

周云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章骏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郭金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性的物质基础，而以持续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则是实现持续较快增长的根本路径。

作为人类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历程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世界上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国家整体面貌发生了根本变革，14亿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由这一现代化实践而凝练出来的经验、路径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并为其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更多的道路选择（路风，2022；赵义良，2023）。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阐明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产业升级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路径和前提，而企业创新是促进产业升级从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动力。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促进企业创新和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

## 一、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

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和繁荣富强一直是中国领导阶层和普通民众的执着追求，长期的实践证明，全面而深刻的现代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历程的一部分，因而必然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比如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组织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另一方面，各国现代化的具体实现路径必然受本国历史传统、社

会结构和发展状况及国际环境的影响，因而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为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特征。很明显，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根植于我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成功的发展经验，同时也在极力避免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犯下的严重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重大危害。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应当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3页），并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54页）。这体现为每个人更有能力、更有机会去追求和实现自己所珍视的目标，或者说个人可行能力的扩展（森，2013）。显然，中国式现代化必将致力于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增长并非发展的根本目的，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创造是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现实基础，因此，经济增长是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基础条件。

由于经济增长并非发展的目的，而只是实现发展目的的手段，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唯增长论”或“唯GDP论”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危害，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正是要追本溯源，抑制和消除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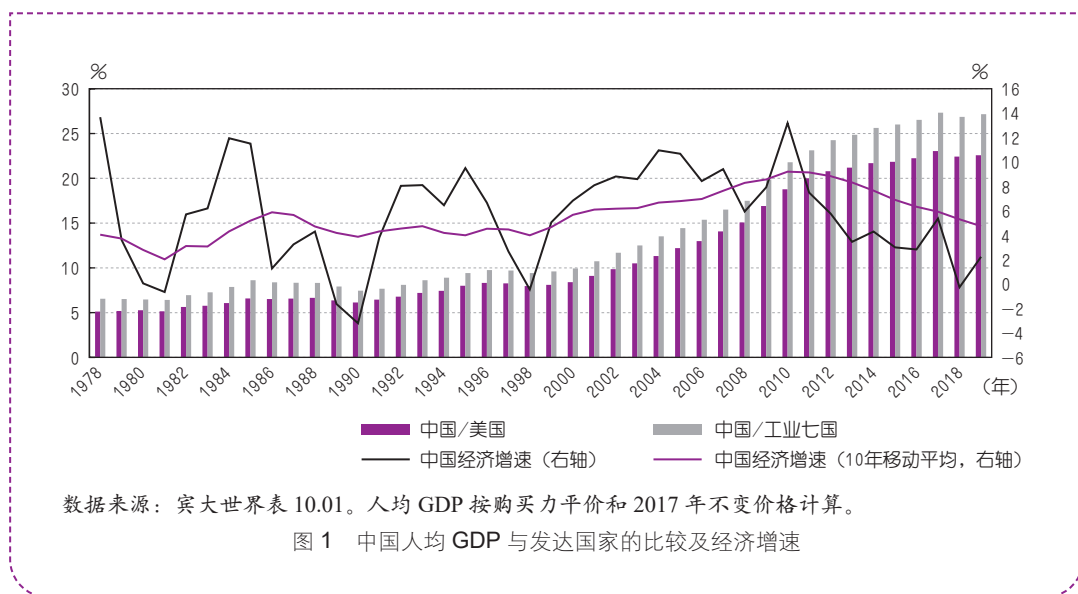


是，破除“唯增长论”并非一张遮盖布，不应被用来掩饰由于政策失误或者未能有效解决明显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而出现的经济增长失速的现象，保持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其中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后发优势决定了我国仍然具备较快的增长潜力。后发优势是决定后发国家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并且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特别是在“中等收入”及其以后的阶段，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樊纲，202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经济高速增长极大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人均 GDP 相对于美国 and 工业七国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5.12% 和 6.55%，分别提高至 2019 年的 22.57% 和 27.16%（图 1）。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说明与发达经济体仍有较大

的差距，中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仍然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考虑到中国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一些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后发优势将更为显著。明显的后发优势决定了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仍处于较高水平，其他成功实现经济赶超的东亚经济体的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以与美国的收入差距作为后发优势的衡量指标，中国 2019 年人均 GDP 与美国的比例大致相当于日本 1956 年和韩国 1986 年的水平。日本从 1956 年至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 1973 年，人均 GDP 年均增速达到了 8.2%；韩国从 1986 年至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 2007 年，年均增速为 7.46%。这意味着依据中国目前的后发优势，仍有潜力在未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 6%~8% 的高速增长。

当然，后发优势只是决定增长潜力的



一个因素。中国与日韩两国的人口规模存在较大差异，并且面临不同的内外部环境，这可能使得中国目前的潜在增长速度低于日韩当时的水平。尽管如此，从图 1 可以发现，2010—2019 年，中国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略有缩小，但是经济增速出现了大幅下滑，这意味着潜在增长速度仍可能高于目前实际的增长速度。只有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实际增长达到潜在增长的水平，才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促进财税增收，进而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

其次，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是实现中国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为了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2020 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了 2035 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届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中国目前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及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速，经过简单的估算就能推断出，中国未来人均 GDP 年均增速应保持在 6% 以上，才能实现这一远景目标。从中国目前的增长潜力来看，这一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最后，只有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从长期来看，高质量发展必然体现为较快的经济增长，而较快的增长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显然，只有把蛋糕做大，每个人才有可能分得更大的一块蛋糕。与通过削减高收入来补偿中低收入者相比，以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更快增长来缩小贫富差距，更有助于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也有利于为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提供必要的激励。同样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其他本质要求，都需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以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

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从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这也是导致发达经济体和后发经济体收入水平产生重大差距的直接原因。根据诺思等（2013）的研究，2000 年人均收入低于 2 万美元的 153 个国家，经济实现正增长的年份所占的比例为 66%，平均增速为 5.35%，出现负增长的年份平均增速为 -4.88%；而人均收入高于 2 万美元的 27 个非产油国，实现正增长的年份所占的比例为 84%，平均增速为 3.88%，出现负增长的年份平均增速为 -1.33%。这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尽管在实现正增长时的增速要低于欠发达国家，但是出现经济衰退的概率远低于后者，并且衰退的幅度也远小于欠发达国家。更为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后发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即使在受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和 2020 年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经济也保持了正增长。但是，自 2010 年至疫情发生之前的 2019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持续下滑，在面临后发优势减弱、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避免经济出现较大的波动，保持增长的稳定性，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



期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 二、产业升级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路径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只能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收入水平的提高引发需求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从而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产业升级一方面表现为同一产业内部的生产活动向更为先进的产品或生产环节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要素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转移（王勇和汤学敏，2021）。在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地利用后发优势，以较低的成本学习、模仿和吸收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组织方法和发展经验，从而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产业升级。发展经济学正是因为观察到这种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将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结构主义”理论，以区别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以总量提高为主要内容的特点。收入水平的提高为产业升级注入动力，同时，体现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持续的产业升级也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路径和必要条件。

### （一）产业升级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路径

在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后发优势使得后发国家拥有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增长的潜力。在后发优势明显消失之前，保持经

济稳定且较快的增长，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增长潜力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当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时，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释放出来，转移到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即使在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总产出和人均产出均有可能实现较快的增长。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变化，这将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倒逼产业升级与转型，生产活动向技术水平和附加值更高的领域与环节集中，由此才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4~5倍，尽管近些年来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但是直至2021年仍然分别达到4.27和3.51倍（图2）。由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大量劳动者快速地由农业部门转移至非农业部门，这种经济和产业的结构转型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至2021年，农业劳动者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已经由1978年的70.53%降至22.87%。由于农村劳动力存在广泛的兼业现象，并且从人口结构来看，现有剩余劳动以年龄偏大、教育程度偏低的劳动者和女性劳动者为主，向非农产业转移，特别是异地转移的可能性较小（王庆芳和郭金兴，2021）。随着农业劳动者绝对数量和相对占比的减少，这种由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减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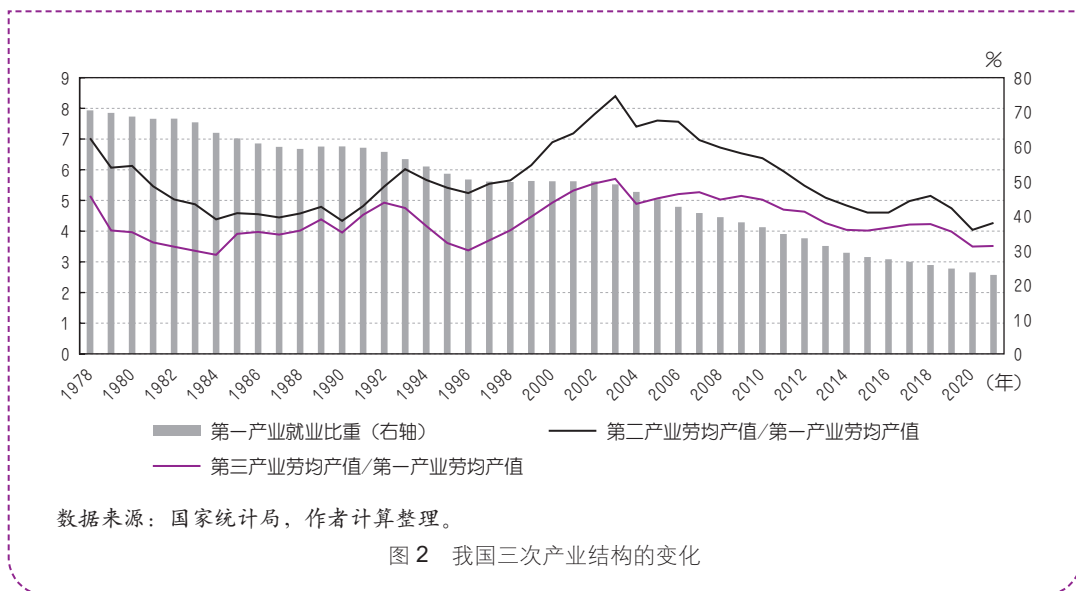


图2 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

从不同行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来看，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持续性的变化。除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营方式的转变使第一产业占比大幅提高以外，其他时期一直呈稳定下降趋势，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三分之一降至目前的不足8%。1978年以后，由于我国改变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1990年之前，工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下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工业占比的变化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所描述的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对服务业的需求持续增加，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扩张的速度明显加快，并且在2015年增加值占比超过了50%。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有所增加，而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占比则

有所降低（图3）。持续的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活力，也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

## （二）产业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很多后发经济体在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其后发优势或者某种有利的外部因素，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拉美和东南亚的一些经济体都曾经做到过这一点，并被冠以某种“经济奇迹”的称号。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一赶超的过程经常由于各种因素而中断，从而使后发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迈过高收入门槛，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1960—2014年的55年间，50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仅有11个跨越高收入门槛，同时也有9个经济体回落至低收入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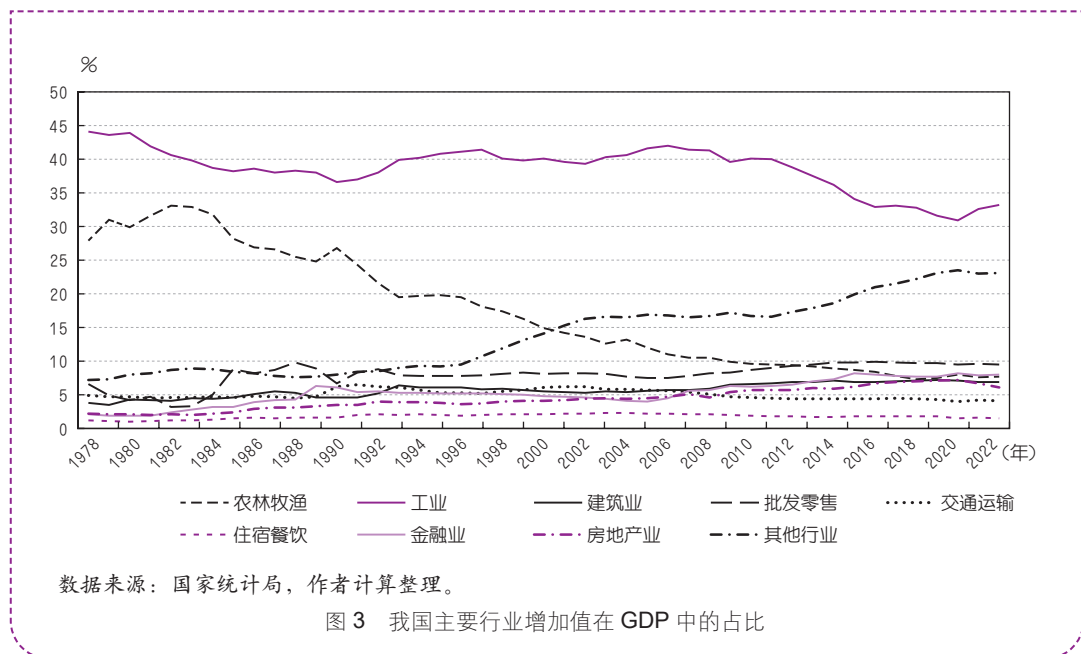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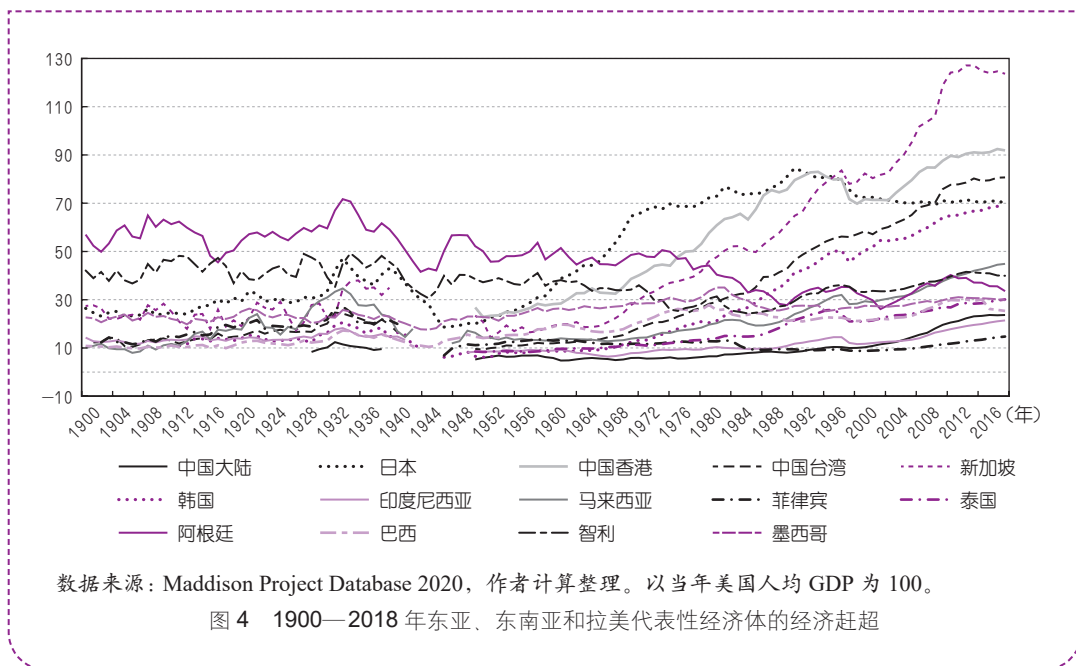


图 3 我国主要行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

别。在 11 个升至高收入组别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除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外，其他均为欧洲边缘国家或者人口在 100 万左右的小型经济体，跨越陷阱的难度可见一斑（郭金兴等，2020）。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1900 年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相比，在东亚、东南亚和拉美这三个典型地区，只有东亚地区的代表性经济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现了明显的赶超，而东南亚和拉美的经济体则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图 4）。而且，后发经济体的赶超也并非一个平稳的过程，阿根廷和智利等拉美国家原本在 20 世纪初期处于较为发达和富裕的水平，但是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即使是被视为成功赶超范例的日本，

自 1991 年经济泡沫破灭以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收入也下降了将近 15 个百分点。

按照世界银行划定的标准，中国先后于 1997—1999 年和 2010 年从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目前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接近于世界银行的高收入门槛。当然，世界银行所划定的高收入门槛是偏低的，而且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和高收入门槛值也在不断提高，因此，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易事。需要关注的是，正是在 2010 年跃升为中高收入经济体之后，中国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也引发了中国经济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疑虑和争论。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随着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国际竞争中，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领域面临发达国家的压



力，同时，在劳动密集型领域面临低收入国家的压力。因此，只有通过产业转型和升级，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不断向技术水平更高和附加值更高的环节迈进，化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才有可能实现收入水平持续较快地提高，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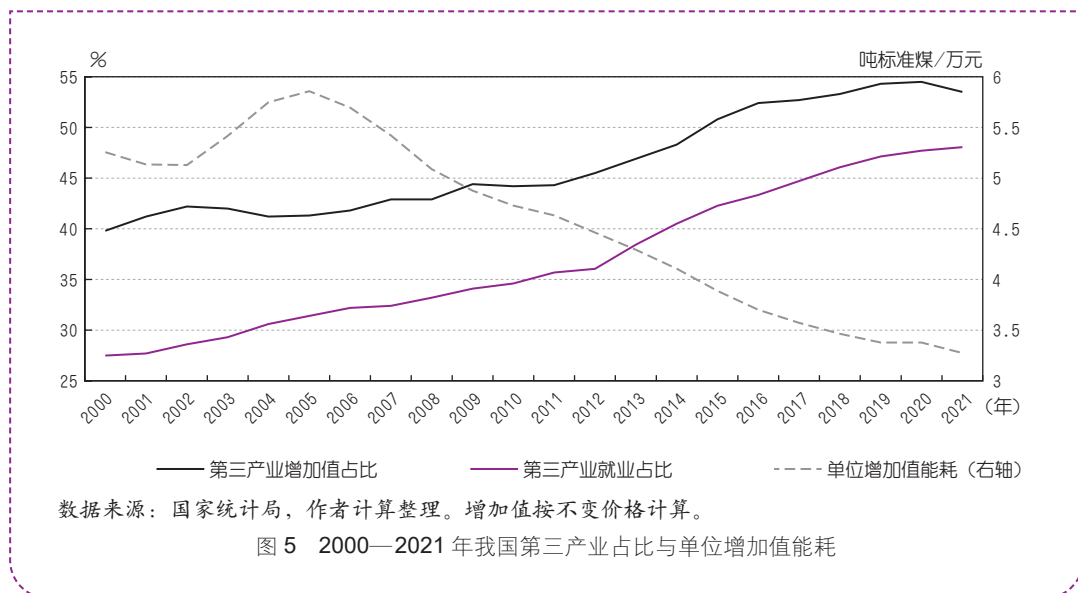
### （三）产业升级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以持续的产业升级为前提条件。产业升级不仅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且还通过其他的途径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重要的贡献。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意味着生产要素从效率较低的产品、环节和部门释放出来，转移至效率更

高的产品、环节和部门，需要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要素，也需要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劳动者，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产业升级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产业升级有助于实现资本积累，这会改变资本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禀赋的结构，使劳动者相对于资本而言更为稀缺，从而提高劳动报酬相对于资本报酬的比例，改善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状况。产业升级将促进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从而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必要的激励，这也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性收入。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将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是产业升级





的重要动力，产业升级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只有通过持续的产业升级，才能不断降低单位产值的能耗，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提高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2000年以来，无论从增加值还是从就业的占比来看，第三产业呈现持续提高的趋势，而单位增加值的能耗在2005年达到高峰之后，也出现了持续的下降（图5）。与2005年相比，2021年的单位能耗下降了44.09%。教育培训和现代服务行业的占比提高和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和精神世界的丰富。同时，中国经济以和平方式实现产业持续转型升级，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企业创新是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动力

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由于物质资本存在边际生产力递减的特点，从长期来看，创新和技术进步甚至是实现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的唯一来源。企业是创新活动的主力军，并且担负着将知识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新产品的重任。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企业从事大量的创新活动，这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也有助于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企业创新需要良好的营商环境，而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企业创新的一种最为宝贵的稀缺资源。

#### （一）创新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创新以及由创新而实现的技术进步是



经济增长主要的乃至唯一的源泉（Solow, 1956；Lucas, 1988）。现代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实现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根源就在于以创新作为驱动增长的动力，并且在现代经济体系下，创新具有持续性。以创新作为增长动力和创新的持续性，是现代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两个重要特点。从人类长期发展的历史来看，在某些地区的某些时期，也曾经出现过经济增长，但是这主要是由于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和人口规模的扩张，而不是由于创新和技术进步。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是极为缓慢的，并且经常由于各种原因而中断。持续的创新、技术的进步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是现代经济的伟大成就。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用短短二百多年的时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

在现代经济中，之所以能够实现持续的创新，是因为形成了更为包容和开放的理念和制度。创新会导致新旧更迭，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熊彼特，2020）。这意味着既有的观念、利益、结构和群体会遭受冲击、损失乃至毁灭，因而必然会遭遇某种抵制和反抗。如果缺乏包容的观念，一些创新的理念将会被扼杀在襁褓之中，因为这些理念在开始时经常被人视为“异端”；如果缺乏开放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创新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就有可能借助市场以外的力量来抵制创新，而不是主动地去适应和参与创新活动，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失去创新的动力和经济的活力。因此，只有具有更为包容和开放的理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创新才有可能得以尝试，并以实践的结果来检验创新的效果。

从创新的形式和内容来看，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有显著的区别。发达国家由于处于创新的前沿，创新活动以自主创新为主，而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产业结构和发展政策，因此以模仿创新为主。在经济赶超的初期和中期阶段，模仿创新是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在经济赶超的后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后发优势的减弱，模仿的空间逐渐缩小，因而必须经历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转变。由于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的机制、成本和风险及与之配套的政策和制度有显著的差别，因此，这种创新模式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如果无法顺利实现这一转变，就难以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

## （二）企业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柱

全部创新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基础创新提供基础性的理论知识和通用型技术，由于可以应用于很多不同的领域，具有广泛的外部性，难以转变为企业的专有资产和专用资产，因而需要政府和社会机构提供资助，并由



专门的科研院所和研究机构来完成。企业在应用创新中发挥主力作用，通过将理论知识转变为现实的技术和产品，直接服务于市场或者消费者。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时时处处存在的竞争压力为企业注入了强劲的创新动力。同时，企业既是创新成功的受益者，也要承担创新失败的损失，这就迫使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对各种市场信息和价格变化保持足够的敏感，从而使企业创新充分反映资本、劳动、资源和知识等要素禀赋结构发生的变化，提高经济的适应性效率，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随着我国创新模式的转变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研发经费的规模及其在GDP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图6）。在我国全部的研发经费中，企业研发经费的占比从2002年的54.98%上升至2021年的

78.01%。在受理的专利申请中，企业所占的比例由2002年的不足6%上升至2021年的18.19%。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申请的专利中，非国有企业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至2021年已经达到98.33%，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私营企业的占比则由2011年的28.93%提高至2021年的51.39%。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活跃的创新活动是中国经济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

### （三）企业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力

企业的创新活动不仅包括开发和应用新产品、新材料和新技术，还包括使用新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法，开拓新的市场，如此广泛的创新成为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力。企业创新改变了现有的市场结构和要素禀赋的结构，以更先进的、生产效率更高的技术代替原来的技术，以质量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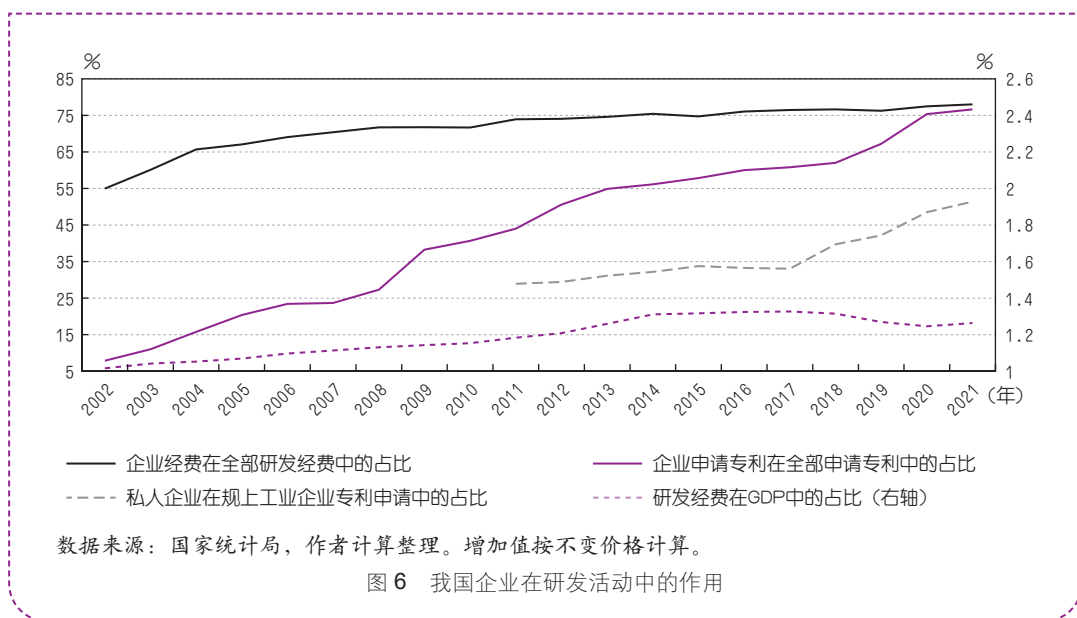


图6 我国企业在研发活动中的作用



的或者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代替原来的产品，推动企业不断向技术水平更高、资本和技术更密集、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和部门集中，从而实现产业结构持续的转型和升级。

企业创新是促进产业升级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经济史学家对第一次工业革命进程的研究表明，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牛顿等人所推动的科学革命就已经实现了理论知识的巨大突破，但是这些知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并未发挥重要作用，发挥直接作用的是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织机和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进（莫基尔，2020）。高明的工匠和企业家共同发挥作用，才启动了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同样地，在此后的历次工业革命和大规模的产业升级中，企业创新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四）弘扬企业家精神是实现企业创新的必然要求

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家精神的精髓在于创新，在熊彼特（2020）看来，墨守成规的企业家不过是循规蹈矩的官僚循吏。自古以来，世界各国都曾经涌现过拥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但是，只有近代以来，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及企业家精神对于经济活力的重要意义才得到正确的认识，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方可比肩科学家、政治家或军事家，甚至超乎其上（兰德斯等，2021）。

企业家社会地位的这种转变并非由于

政治家赋予的特权，而是包容和开放的制度使每个人都拥有了创新和创业的权利，这种权利得到了民众和执法者的充分尊重，由此才能激发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激情及承受风险、勇于进取的企业家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天赋，我们无法事先了解这些天赋存在于哪些个人或者群体的身上。因此，只有创造一个人人都有机会和权利成为企业家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充分发掘和利用这种宝贵的天赋。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条件。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对市场和社會中存在的各种套利机会极为敏感。如果缺乏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企业家也有可能利用其中存在的缺陷，以社会利益为代价来牟取个人私利。因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正确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使企业家的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的前提条件。企业创新和经营活动都是风险极高的行为，正是成就一番事业的企业家精神促使企业家勇于承担这样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应当形成可信可靠的制度安排，以保障企业家由于创新、经营和承担风险而获得的正当收益，由此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真正激发企业家精神。

## 四、结论和建议

根据本文以上有关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企业创新的论述，提出以下三点结论和建议。



### （一）促进产业升级与企业创新，实现稳定增长，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产业升级并非一个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过程，需要具备一系列的内外条件 and 软硬件基础设施，这一条件被概括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组合（林毅夫，2017）。这既需要有一个较为完备的市场体系，使商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充分反映生产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为企业创新和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实现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激励；又需要政府适时调整调节和调控市场运行的政策和方式，并提供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比如和平和秩序、教育和医疗、交通通信、稳定的宏观环境和基础性创新等。显然，实现产业持续升级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一国的制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恰恰是很多后发国家的短板，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张军扩等，202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经验。市场机制必须在资源配置时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有效市场是促进企业创新和实现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这里的有效市场是指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市场价格能够充分、快速、准确地反映商品和要素的供求关系和稀缺状况，从而为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激励。

有为政府是对有效市场有益的补充和调节，但这并不意味着滥用政府权力或对市场运行进行任意的干预。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需要政府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包括斯密指出的和平、税赋和司法，在现代经济中，政府还需要承担更重要、更广泛的职能。比如，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创新创业的失败者和“创造性破坏”中的利益受损者提供必要的救助，从而缓和抵制创新的社会压力。

### （二）促进企业创新，实现稳定增长，需要政府为企业创造稳定的和可预测的政策环境

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是一种动态平衡的过程，不确定性是广泛存在的，从某种角度来讲，企业家的职责就是应对这些不确定性。但是，一些由于市场以外的因素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是很多企业无法应对的，比如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作为，采取有效措施，以避免市场和经济的崩溃。2020年以来，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采取了激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

但是，另一方面，政府的不当干预也会人为地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和经济稳定增长，即使有时这种干预是出于良好的政策意图。在经济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一项政策对某个行业和部门所产生的直接影响，特别是通过行业之间的关联及通过就业和收入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其规模可能远远超出政策

制定者的预期能力。因此，在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时，应当谨小慎微，对市场的力量怀有敬畏之心，并且充分尊重企业和企业家在创新和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地位和权利。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应辅助、调节甚至干预市场的运行，而是应当增强政策环境的可预测性。一种可以选择的方法就是政府基于既定的、公开和公正的规则来制定和实施政策，并依据合理的程序来调整和修改规则。这有助于抑制任意的政策对市场和企业造成的破坏，从而使企业对政策环境形成更为确定的预期。这些规则是对政府的约束，也是对市场和企业的保护，并且符合依法治国的现代化理念。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制度保障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强大的国家能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四十多年来，尽管巨大的后发优势是中国实现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但是这种

后发优势决定的仅是增长潜力，同一时期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具备这种优势，但是，其中大多数国家并未取得类似于中国的发展成就。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并且在这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强大的国家能力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市场体制的完善及技术和经济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国家能力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方法也必然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国家经济治理必须遵循依法治国的理念，政府制定和实施政策应当依据正当的程序和规则。随着经济体系复杂程度的提高，政府所拥有的信息优势逐渐减弱，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当建立和健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渠道，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并且协调相关利益群体的权益和诉求，使制定的政策更加合理和科学，真正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长期的总体利益。[N]

学术编辑：韦燕春

#### 参考文献

- [1]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2] 戴维·兰德斯,乔尔·莫克尔,威廉·鲍莫尔.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 [3] 道格拉斯·C.诺思,约翰·约瑟夫·瓦利斯,巴里·R.温格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
- [4] 樊纲.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J].管理世界,2023,39(02):13-21+37+22.
- [5] 郭金兴,包彤,曹亚明.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J].江淮论坛,2020(02):92-102.
- [6]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经济学(季刊),2011,10(01):1-32.



- [7] 林毅夫.产业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9(02):148-153.
- [8] 路风.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22(01):36-62+204-205.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和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 [11] 乔尔·莫基尔.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 [12]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13] 王庆芳,郭金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2010—2018年[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41(12):93-110.
- [14] 王勇,汤学敏.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定量事实与理论进展[J].经济评论,2021(01):3-17.
- [15] 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9.
- [16] 张军扩,罗雨泽,宋荟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迈上高收入阶段的制度影响——透视与探索“制度高墙”之谜[J].管理世界,2023,39(2):1-12.
- [17] 赵义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2023(03):47-59+205.
- [18]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高培勇,黄群慧.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识、经济前景与战略任务[J].经济研究,2022,57(08):26-39.
- [19] Lucas Robert 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22 (1): 3-42.
- [20] Solow Robert 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70(1):65-94.

###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ZHOU Yunbo ZHANG Junbin GUO Jinxing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Ensuring sustainable and relatively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is a prerequisite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se goals need to be achieved as the nation strives to attain common prosperity and maintain a harmonious bala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Sustainably transforming and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he key to maintaining stable and relatively high-speed growth and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the main engine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stable growth. Facilita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requires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as well as encourag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enhancing the predictability of the policy environment.

**Keywords**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Upgrad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O4 O31 O53